

太平洋华人的不同经验

Bill Willmott

我在中国成都出生长大, 而我对中国的情愫一直延续到今天。海外华人社团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主要课题, 我先是在柬埔寨, 然后是加拿大, 最近是在太平洋群岛国家陆续进行研究。我对中国社团的兴趣一直都在社会和文化而非政治方面。对我来说中国政府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和活动并没有太大兴趣, 除非它影响到我所研究的华人社团的结构及其活动。

大多数最近关于“太平洋岛国的华人”的文章要么专注在北京和台湾之间的争斗, 要么专注在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援助和商业角色。而在我看来, 对南太平洋华人社团的研究才是日益扩大的对海外三千万华人研究的盲点。著作方面, 只有 David Wu 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宝贵研究, Stuart Greif 关于斐济的书差强人意, Gérald Coppenrath 关于塔希提的书早已过时, 再加上 Nancy Tom 关于西萨摩亚的小说式的诠释。¹我带着两个目的开始了我的研究: 以有用的信息填补该空隙并鼓励华人研究他们自己的社团。虽然在两个方面我都成功有限, 但是 Bessie Ng Kumlin Ali 最近关于斐济华人的著作却是一个对太平洋华人研究的很好补充。²

鉴于实际操作的限制, 我决定将我的研究领域局限于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再加上密克罗尼西亚的 Kiribati 和瑙鲁 (Nauru), 而避开巴布亚新几内亚, 因为 David Wu 和 Christine Inglis 已经提供了关于该国的足够研究资料。³正如夏威夷一样, 密克罗尼西亚的其他部分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中国移民模式。所以我的决定无论从历史学或社会学方面来说的都不是完全任意的。

我马上发现该地区的华人人口总共不超过 20, 000 人, 这个区区数目又散布于十六个国家和地区中。但是这样小的数字恰恰提供了有价值的, 对散居的华人社团性质做比较研究的一个“实验室条件”。⁴身为社会人类学家, 我一直视比较为社会学方法论的中心。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放弃这种观点, 尽管太平洋群岛的社团大小和现有的可用资料的性质将我变成了更像一个业余的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个有洞察力的社会学者! 但无论如何, 看着这样一个广阔和多样的地区, 一个人不能不思考在如此广袤的太平洋小岛上作为“华人”到底意味着什么。⁵

¹David Y.H. Wu,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 1880-1980》(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2); Stuart William Greif, 《斐济的海外华人》(台北: 华人文化学院, 1977); Gérald Coppenrath, *Les Chinois de Tahiti: de l'aversion à l'assimilation 1865-1966*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ciété des Océanistes, no. 21, Musée de l'Homme, 1967); 和 Nancy Y. W. Tom, 《西萨摩亚的华人, 1875-1985: 远方的龙》(阿比亚: 西萨摩亚历史和文化基金, 1986)。

²Bessie Ng Kumlin Ali, 《斐济的华人》(苏瓦: 南太平洋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 2002)。

³Wu,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 和 Christine Inglis, “社会结构和经济活动模式: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 博士论文, 伦敦大学, 1978。

⁴Bill Willmott, “太平洋群岛国家华人的经济角色和社会身份” 《Ethnic 华人经济研究》ed. Xiao Xiaoqin and Li Dingguo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 pp. 504-11, esp. p. 504。

⁵我有一个 1997 年有关这个题目的论文题为“什么时候才是华人? 太平洋群岛华人的民族性和身份,” 从未发表。其中有一部分在这里出现, 我很高兴将原稿发给感兴趣的人。

在太多的情况下学者们将不同起源，不同阶层，甚至不同历史时期的华人集合在一起研究。但是华人社团间的不同——以及社团内的不同——证明，这种简单的分类法是错误的。王赓武教授对我们深有教益，他依据民族，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将华人分为四类。虽然他的模式有很多问题，但他确实警告我们不能将所有“华人”视为文化或政治上完全等同。⁶华人老移民和太平洋地区最近几年新移民之间的对抗绝对证明了这一观点。中国政府也通常与当地华人社团的联系有限。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早期到南太平洋的华人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近一次移民潮的华人当然大为不同。早期的移民模式符合王赓武教授总结的世界海外华人移民史。他将过去两个世纪的中国移民分为四种模式。第一种也是最持久的模式是华商，那些到国外寻求商业机会的人。十九世纪晚期，另一种形式出现了，也就是华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非华人公司签订合约出卖劳动力。华侨，或称旅居者，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出现，并形成了稳定的社团并与祖国保持联系，他们通常包括华商和华工。而在过去三十年中，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华裔。这第四种形式包括那些有中国祖先但不再与他们的祖国相连而相对自由地在全球经济里活动，再移民，以获得新机会的人。⁷

甚至在第一次移民潮之前，华人在十八世纪末就作为厨师和木匠进入南太平洋群岛寻找檀香木和海参，虽然直到 18 世纪 40 年代时还没有华人在群岛中定居。⁸他们于 1844 年抵达新赫布里底群岛，1846 年抵达新卡拉多尼亚，⁹然而现在这些岛上的华人人口中却没有这些第一批抵达者的后代。是那些意志坚强的商人-华商，在十九世纪中期紧跟着他们的脚步成为了南太平洋群岛上定居下来的第一批华人。¹⁰

这些第一批定居者形成了小型华商的核心，他们在群岛中除了两个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里一直繁衍延续到今天，他们的孩子与较近抵达的人结合，延续了华人社团。最早的华商 1852 年在塔希提，1855 年 Levuku（斐济），可能 1855 年，在阿比亚定居，然而其中一些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在 Rabaul（德属新几内亚）定居，而有一些人于 1880 年抵达吉尔伯特群岛，后来更于 1882 年抵达库克群岛。现代库克群岛和 Kiribati 是个例外，在每一个地区都有一小部分中国商人与当地女人结婚，他们的孩子当然不会为

⁶ 王赓武，“东南亚的华人身份研究”，《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南亚华人的身份变更》ed. Jennifer W. Cushman and 王赓武（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88），pp.1-21, esp. pp.11-16。同一背景下的不同观点见 Charles Hirschman，“东南亚华人身份：不同观点”，pp. 23-31。

⁷ 这种不断的移民的确说明了一些早期太平洋群岛的华人移民特征：他们首先去加利福尼亚，再去维多利亚的金矿，然后再移民到太平洋的其他地方追求利益。然而看上去那时的他们无论社会上还是感情上都强烈的与他们在华人的村庄相联系。

⁸ 关于更多的太平洋华人的早期历史，见 Bill Willmott，“南太平洋华人起源”，《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华人历史》，ed. P. McGregor（墨尔本：华人澳大利亚历史博物馆，1995），pp. 129-140。早在 1802 年，当第一个制糖者支起炉子时，华人就居住在三文治岛了，但是夏威夷这个地方超出了本文的限制。见 Bill Willmott，“十九世纪太平洋群岛的华人合同工”，《太平洋研究学报》，27, 2 (2004): 161-76, esp. 163。

⁹ Bill Willmott，“东美拉尼西亚华人社团历史：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新卡拉多尼亚”（基督城：太平洋研究麦克米兰布朗中心，工作论文 12，坎特伯雷大学，2005），pp. 33, 53。

¹⁰ Copenrath, *Chinois de Tahiti*, p. 26; Willmott, “华人起源”，pp. 130, 138n2; David Y. H. Wu, “新几内亚华人：移民人口的适应”，45 届澳大利亚纽西兰科学发展协会大会讲稿（打印文本），1973, pp.1-34; 和 Richard Gilson, 《库克群岛 1820-1950》（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出版社，1980, p. 51。在 20 世纪，最早的华人在 1912 年到达所罗门群岛，然而现在瓦努阿图的社团可追溯到 1912 年 Ah Pow (Zhang Yabao) 的到来，这个人以前是政府船 *Euphrosyne* 上的厨师。而第一个华人餐馆老板 1953 年从塔希提到新卡拉多尼亚定居并建立了社团，那几十九世纪晚期的几个华人商人到 1926 年后已经全部消失。两个 1920 年代的英国国教牧师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离开。到 1974 年一个台湾商人抵达时，汤加连一个华人都没有。Willmott, “华人起源”，p.136; 和“东美拉尼西亚华人社团”，pp. 10, 34, 54-56。

了维持岛上的华人之存在去刻意保持他们的华人身份, 尽管他们中现在还有一两个会说华语。

随着许多岛上中国商人的出现, 契约华工从 1865 年以很大的数量被进口到法属波利尼西亚 (塔希提和 Marquesas), 从 1891 年进口到德属新几内亚, 1903 年进口到德属萨摩亚, 而从 1906 年进口到瑙鲁和巴哈马岛。¹¹那些到塔希提的是客家人, 首先是汕头招收的, 然后是香港, 而那些到新几内亚的从新加坡, 澳门和汕头招收, 可能包括客家人而且还有广东人。瑙鲁、巴哈马和萨摩亚的中国劳工则来自澳门和香港。另一支契约华工是 1884 年在澳门招收的, 做镍矿的矿工。但这一政策没有继续下去, 因为其他渠道的工人价钱更加便宜。¹²如在库克群岛上的商人一样, 这些华工的后人及他们的本地人妻子都消失在后来在新卡拉多尼亚的卡纳克 (Kanak) 人当中了。

第三个华人往太平洋地区的移民潮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当时除了汤加, 所有太平洋群岛都是法属, 英属, 澳属, 或新属殖民地。其中六个国家 (法属波利尼西亚, 西萨摩亚, 斐济, 新赫布里底群岛, 所罗门群岛, 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有华侨社团发展到包括华侨商人的妻子, 孩子。这些有组织社团的存在提供了华工有中国血统的孩子以华人身份参与的机会。这时太平洋最主要的华人社团是国民党组织, 只有在新赫布里斯群岛华人社团不同。¹³最用心建造的社团在塔希提, 那里的华人口规模几个包括了学校和国民党的华人组织发展壮大。¹⁴1936 年斐济也有一个华人学校建立。¹⁵

太平洋战争 (1941-45) 严重阻挠了瑙鲁, 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华人社团的发展, 日占期间他们中的很多人撤离了该地区。然而, 在其他群岛国家, 战时经济却加强了华人的地位, 尽管移民被阻断了大约 20 年 (1940-1960)。在随后的日子里, 一些华人随着他们的地位独立, 离开了群岛, 但茁壮发展的社团仍存在于大多数国家里。现在, 第四次全球华人移民潮 (华裔), 他们经历了经济和民主的增长, 而与之相应却是社团的退化。从香港, 台湾, 中国和马来西亚来的新移民多元化了这些社团但却在这个新空间上将他们的身份分割开来。

这一简短的历史回顾已见多样性是如何分隔了这些地区和社团,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人口学统计差异是历史上的性别比例。在瑙鲁, 华人劳工被严格地与本地人分隔开来, 但是在西萨摩亚和塔希提, 早在太平洋战争前就有一些华人男性劳工与岛上的女人共同生活。他们的后代因此在两种文化氛围里成长, 因为男人们维持了华人社团的联系使得他们的孩子得以发展出一个显著的中国身份。而在新卡拉多尼亚, 基里巴斯或库克群岛, 由于社团的缺乏, 华人的下一代就缺乏保持显著中国身份的机会。¹⁶因此, 今天阿比亚和帕皮提的华人社团包括许多声称兼有波利尼西亚和华人传统的人。在大多数其它南太平洋群岛国家中跨种族婚姻的缺乏使得这一复杂情况在那里变得远不相关。

¹¹ Willmott, “华工”, 166-70。

¹² Willmott, “东美拉尼西亚华人社团,” p. 54。

¹³ Willmott, 《东美拉尼西亚华人社团》。p. 37。国民党是华人共产党的政治及军事对手, 1949 年被共产党打败后流亡到台湾并建立了分离的政府。

¹⁴ Coppenrath, *Chinois de Tahiti*, pp. 59-63。

¹⁵ Ali, 《斐济的华人》, p. 153

¹⁶ 1988 年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人口调查, 最后一个划分民族的人口调查, 显示 14% 的华人有不同民族父母, 几乎所有的都是波利尼西亚母亲。声称有部分华人祖先的人超过 20, 000, 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不认为自己是华人。华人中, 每 100 个女性中有 110 个男性, 这些人口正在老龄化, 因为家庭正在缩小, 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塔希提身份。现在塔希提民族通婚变得普遍。

另一个有文化学意义的人口差异是这些国家里华人来自的不同地方。许多十九世纪的中国商人是客家人，来自福建厦门港。然而，当世纪交接时，广东移民却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大多数第一次和第二次移民潮中的移民是广东人。他们的语言因而占据了南太平洋的主导地位。但在塔希提和新卡拉多尼亚，人们都说客家话，因为大量的客家劳工语言上主导了塔希提的社团，稍后有许多移民前往新卡拉多尼亚。¹⁷

这样，太平洋群岛华人社团与东南亚华人社团非常不同，而更像北美，澳洲和新西兰的华人社团一样，在 1975 年以前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语言多样性，¹⁸使他们的华人身份复杂化。帕皮提或努美阿的华人说客家话，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华人说广东话，而且那些中文学校自建校之初就教授这些语言。

今天的情况远远复杂于当时。比如在 Nuku'alofa，汤加的首都，那里的人都是最近到达的移民，那里的华人从广州和香港（说广东话的地方），厦门和台湾（说客家话的地方），新加坡和上海以及中国其他地区（说普通话的地方），甚至内蒙古等地方来。有时候还有天津的建筑队。在霍尼亚拉（Honiara）也有从中国大陆和台湾来的一部分新近移民，还有几个马来西亚华人公司在那儿也有居民职工。一些从中国大陆，台湾，和马来西亚到这里来的华人和大部分广东人以及一两个客家人家庭也共同生活在瓦努阿图。

在某种程度上，民族性比较不复杂的是塔希提和 Nouméa 这个新卡拉多尼亚首都的华人社团，那里法国政府除了少数临时厨房工——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是广东人而不是客家人——只允许很少的移民。西萨摩亚华人移民仍旧保持最单纯的成分，因为所有新移民，包括餐馆工人，都是广东人，而且没有台湾或马来西亚移民。1992 年阿比亚有几十个修建新政府办公楼的建筑工人，但是他们和当地华人社团居民的隔离几乎是完全的，并且他们的隔离还被所居住建筑工地的高铁丝网标志化和强化。

以前，陈志明（Tan Chee-Beng）博士曾说明分散中的中国社团的文化共通处是中国新年庆祝。¹⁹但甚至这一个标准也不再能够适用，因为我的研究发现所罗门群岛的华人在 1 月 1 日庆祝新年，而不以任何形式庆祝阴历新年。

经济上，太平洋地区的华人近几年中也变得更多样化。历史上，南太平洋的华人要么是契约劳工或餐馆，零售，或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再加上新赫布里斯群岛（瓦努阿图），和库克，吉尔伯特，和所罗门群岛跨岛交通行业。然而在最近十年里，随着中国合同工的再出现和马来西亚，台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跨国公司的到来，他们的经济角色变得更加多样化。另外，一些华商居民的孩子从国外学成归来，成为医生，牙医，会计，和律师。把所有华人划归进狭窄的经济范围再也不可能。

¹⁷一些塔希提的华人竭力证明他们的社团不是华工而是华商的后裔，他们分布在整个帕皮提岛。[见，Sophie Vognin, “La population chinoise de Tahiti au XIXe siècle,” 比如，《Le Peuplement du Pacifique et de la Nouvelle-Calédonie au XIXe Siècle》（巴黎：L’Harmattan, 1994, pp. 236-37）]。他们的论点非常有说服力，是我句子仔细构成的依据，因为第一批商人说客家话而接下来的一批移民来自澳大利亚金矿。[Willmott, “华人起源”，p. 134]那些说广东话的人也是一样。

¹⁸有时叫做“半民族”。见王，“华人身份研究，”p. 17, n5。

¹⁹陈志明 Tan Chee-Beng, “南太平洋国家：马来西亚的国家建立和在那里作为华人的意义”，《东南亚华人的变更身份》，pp. 139-64。

中国合同劳工最近在太平洋群岛里的五个国家里出现：斐济，瓦努阿图，所罗门，汤加和西萨摩亚。修建阿比亚政府大楼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建工程，他们的建筑队是从中国带来的合同工。另一个新的 Nuku'alofa 机场附近的宾馆建筑是由一个约六十人的天津来的建筑队所建造。²⁰一个中国建筑公司有一个在瓦努阿图，Malekula 岛上建堤坝的合同，那儿运营的几个伐木公司也从中国来，所以会引进中国劳工（数量不详）。在所罗门群岛，运营中的十个外国伐木公司中有四个是中国大陆的公司，其它的是马来西亚和台湾伐木公司。大约有 100 个中国大陆的工人也包括其中。在斐济，华人也在制衣厂做合同工。²¹

这些工人与当地华人居民-主要由商人，餐馆老板和职业人员—不形成经济竞争。在汤加，合同工人是华人社团的组成部分，参与华人组织并享受不同商业中与华人的日常接触。然而在其他国家，合同工人与当地华人分离，居住在围墙包围的居住区或城市中心之外。他们有时使得当地华人社团大为难堪，因为他们的行为虽然与当地的华人如此不同，但却被原住民一律叫做“华人”。

也许对于当地华人社团来说，更为困难的是东南亚和台湾商人的出现，这些人通常是大型跨国公司的代表。这些被当地华裔居民叫做 Chinese 的男人（我发现他们中没有女人），寻求与当地华人社团建立联系，用同根同种作为合作的理由。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当地华裔中有一些对他们的仇恨情绪。在斐济和法属波利尼西亚，当地华人企业已经发展和分化到这样一种程度，任何外来的公司都是直接的经济竞争，这很容易解释了敌对情绪的源头。在其他国家，国际伐木和建筑公司却没有与当地公司形成竞争关系，因为没有当地的华裔公司从事这些行业。但这些外来中国公司仍然引起了问题，因为他们比中国劳工使当地的跨种族关系变得还要复杂。

一个极端的例子可能已经足够证明这一观点，虽然细节必须隐匿。例子是一个台湾商人到一个国家从事商业活动，并成功地以主要工业投资议案吸引了总理。许多华裔居民相信他是个骗子，甚至可能是贿赂犯，根本没有自己的资金也没有商业联系来吸引大笔投资基金。这个商人就反过来指控当地华人通过出口到澳洲获益，而不是在当地投资，因此是在“剥削”这个国家。我所有的证人都竭力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指控。当地华人因此而不得不动用自己的政治关系来保护自己，因此许多人担心这个人的坏名声将坏了所有“华人”的名声。在这样的关头一些人往往希望公开否认他们的华人身份。

汤加也同样遇到了一系列的中国骗子，从香港，台湾，和中国来的都有。他们中的两个人给国王展示了宏大的计划，所有这些骗子都使得当地华人尴尬并使汤加人烦恼。在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许多当地华人相信大型伐木公司将为了快赚钱而极度剥削当地人以及环境，赚钱后就转身离开，而留下当地华人去面对“华人”行为的臭名。

了解这种紧张气氛的要点是，它不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这不像四十年前倾向共产党和倾向国民党社团之间的纠纷，或是一个世纪以前保皇党和共和派之间的纠纷。这样的政治分歧在今天的华人社团中可以忽略不计。²²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经验和观点的分

²⁰对于阿比亚工程，见《太平洋群岛商业》，1994年三月，50。有趣的是修建 Nuku'alofa 旅馆的台湾公司1992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收劳工，这是一个甚至在三年前都不可能的组合。

²¹ Ali, 《斐济华人》，p. 96。

²²比如，1993年当我在汤加，我问一个上海来的商人建立一个台湾大使馆会不会引起问题。“没有问题，”他回答“都是华人。”汤加王国华人会馆融合了从台湾和大陆来的商人。

歧。华裔在几十年里已经适应了太平洋社会并形成了本地身份，接受了许多波利尼西亚或美拉尼西亚的文化。尽管经常与西方商人竞争，他们还是发现了能使自己致富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仍能使当地人获利的活动天地。²³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缓和地，不那么努力地工作并与他们的顾客形成了良好关系。

而相对来说，许多新移民都希望快速致富，全球亚洲公司的代表是如此，由在餐馆打工开始而终于建立自己小企业的个体户也是如此，而没有老华裔所具有的长期的学习太平洋文化的经历。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企业既激怒了当地土著也激怒了当地华裔。

上述的几个原因导致了 2005 年四月霍尼亚拉 Honiara 唐人街的被焚毁和 2006 年十一月 Nuku'alofa 商业中心被破坏。两起事件都是从一个反政府的政治游行演变成烧毁市镇中商业中心主要部分的破坏性暴乱。在 Nuku'alofa，我在十年前已经发现了那里对华人相当的仇恨情绪，然而 Honiara 发生的事却让我完全震惊。那里，我发现所罗门群岛和華人的关系除了没有跨民族婚姻外，几个世纪以来完全融洽。²⁴然而，仇恨情绪滋长了，因为有传言说一些华人富商与现任国会领导人关系不明不白，如 Tommy Chan 爵士所有的 Honiara 宾馆为他们提供免费住宿，人们更怀疑台北的经济援助为总理提供了个人贿赂基金户头。

虽然这些政治因素给暴乱领导提供了一些行为动机，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群众支持去抢夺和焚烧唐人街却是因为群众中日益增长的对一些华人能够扮演新的经济角色的憎恨。大多数稳定的华裔与他们的顾客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们中有些人既是进口产品的批发商也是零售商。同时对有些行业他们不去染指涉足，而留给所罗门群岛岛民，如出租车服务，新鲜产品和小产品零售，包括出售槟榔和香烟摊的生意。然而新来的华人却开始经营这些与当地企业有直接竞争关系的行业。人们也不能忽略这个事实，即霍尼亚拉存在着一个日益增长的无业游民阶层，他们嫉妒任何有财产的人，而中国店有着所有他们所需。

有趣的是，有几个地位稳固的华裔及时接到消息，得知唐人街将要发生抢掠，使他们得以安排拯救他们的财产免于抢掠和焚烧。这同时证明了暴动不是完全自发的，而是由政治精英里的反华人分子组织领导的，同时一些华人和那些精英有很稳固的良好关系。

虽然汤加的情况与所罗门的情况有所不同，其相似之处也很耐人寻味。正如在霍尼亚拉一样，最近华人开始经营传统上汤加人手上的买卖，比如出租车，小食摊和小干货商店，再加上他们明显的与大多数汤加人在财富上的差距都同样引起了憎恨。一个主要的不同在于，汤加的华人社团最近刚刚开始，而所罗门群岛的社团存在了将近九十年。虽然没有华人社团因而参与到汤加的政治中去，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就为汤加民主主义者所憎恨，因为它起源于国王从 1982 年开始的不受欢迎的出卖汤加居民许可证（“护照”）的政策。由于所有的华人都是新移民，那些霍尼亚拉华人所得到的原驻民朋友们给予的保护在 Nuku'alofa 丝毫全无。

²³对华裔的斥责的这种噪声在 20 世纪这种类似《太平洋群岛月刊》的杂志中随处可见，抱怨他们的节俭和低利润收益对英国和澳洲商人是“不公平的”并控告华人不卫生和腐朽的操作。

²⁴所罗门岛民称当地华人“Waku”，这是从广东话 Waku（华侨）而来，我确定这不是一个贬义词。

我认为, 很难说 Nuku'alofa 的暴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反华情绪。示威开始是对那些不受欢迎的皇家和贵族财产的攻击, 迅速蔓延到了华人财产。因为与霍尼亚拉不同, Nuku'alofa 没有唐人街, 很多位于主要街道的, 后来成为抢夺和焚烧受害者的大型商店都是由华人管理的。

我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要证明太平洋群岛的华人社团有很多明显的差异, 要充分理解该地区当代的事件, 我们就不能忽略这些差异。即使事情看上去很相似, 历史和人口学的差异也可以影响华人自己和他们所存在的社会, 因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必须认识到在今天的太平洋地区, 所谓“华人经验”是有许多不同种类的, 有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